

| 符号学丛书 |

符号与意义

丁尔苏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 符号学丛书 |

符号与意义

丁尔苏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符号与意义 / 丁尔苏著.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10

(符号学丛书)

ISBN 978 - 7 - 305 - 10071 - 0

I. ①符… II. ①丁… III. ①符号学-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19970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丛 书 名 符号学丛书
书 名 符号与意义
著 者 丁尔苏
责任编辑 张 隽 施 敏

照 排 江苏南大印刷厂
印 刷 南京玉河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73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0071 - 0
定 价 30.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4756 83686452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作者序

十多年前,我应胡壮麟与刘润清两位教授的邀请,为他们主编的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学研究丛书撰写了一本题为《语言的符号性》的小册子。此后,我经常收到读者来信,与我商榷有关符号学的诸种问题。其中有不少同行对我在书末提到的符号使用“有章可循的创造性”(rule-governed creativity)这一概念特别感兴趣,觉得那里的讨论言犹未尽。事实上,我当时也很想就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阐述,只是在我刚完成该书的第三章时,北京大学来了商调函,我不久北上工作。新的工作与生活环境使得我不能在短期内如愿深入探讨符号使用的创造性问题,故而匆匆写了一段结束语,向刘、胡两位老师交了差。稍后我又去了香港岭南大学英文系,重新适应那里的工作与生活,但我始终没有忘记这一“尚未完成任务”。

说到符号使用的创造性,除了《语言的符号性》第三章已经讨论过词语的外延和内涵机制以及作为元语言操作的试推法,它还与皮尔斯观察到的“指示性推理”(indexical reasoning)和“像似性推理”(iconic reasoning)密不可分。这两种思维方式是语言发生和演变的重要机制,这从汉语的起源和发展中可以得到证明。说得更具体一些,指示性和像似性分别是转喻和其他比喻手法背后的动力或原因。由于喻体的多样性及多义性,符号的意义会朝着不可预测的方向发生变化,从而表现出它们的创造性。另一方面,我们说符号的创造性有章可循,是因为它始终以比邻关系或像似关系为推理基础;不仅如此,在事物与事物之间进行特定的连接还能显示出特定文化群体的集体价值取向。这些是我在前些年里认真思考的学术问题。我在这里将它们整理为“符号的像似性”、“比喻的‘边’与‘柄’”和“比喻的文化趋向”三大部分,构

成本书的第四章,并取名为“符号的实际运作”。因为新增的内容篇幅较大,约占原书的三分之一,我决定将全书改名为《符号与意义》。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本书的前三章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过时。需要更新的只是书中出现的部分术语和人名的中文翻译,使之与大多数学者的习惯用法尽可能一致。这项工作看起来停留在技术层面,但往往涉及对符号学关键词语的理解,因而意义十分重大。例如我在《语言的符号性》第 52 页里提及皮尔斯根据符号形式与指称对象之不同关系而得出的三种符号,即“index”、“icon”和“symbol”。近年来,国内学界就这套术语出现了多种译法。陈宗明教授在 2004 年发表的《符号学导论》中将它们翻译成“指索符号”、“图像符号”和“象征符号”。王铭玉教授在同一年出版的《语言符号学》一书里将它们翻译成“索引符号”、“像似符号”和“象征符号”。陈、王二位的翻译之差别主要在第二个术语。我本人更倾向于王的译法,因为这一类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并非总是图像性的。例如,一个小孩在特定的条件下对着他父母重复发出/滴答/的声响,后者可能会因此而想起发出类似响声的时钟。这里的/滴答/响声并不涉及图像,但它与所指之间照样有像似性。至于皮尔斯的第一类符号,陈、王二位先生的翻译(“指索符号”和“索引符号”)一样贴切,我没有采用他们的译法,是因为赵毅衡先生新近问世的《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一书的附录(符号学术语及人名译名)中已有专家确定的翻译:即“指示符号”。

皮尔斯第三类符号的名称最难翻译。“symbol”一词在英文中的使用本来就非常混乱,翻成中文后更是乱上加乱。著名哲学家卡西尔把人称为“symbolic animal”,译成中文后就成了“象征动物”。其实卡西尔的意思是“(使用)符号的动物”。另一位思想家布迪厄也经常使用“symbol”这一术语。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是“symbolic capital”,被译成中文的“象征资本”。其实布迪厄所说的那种资本并非象征性的,而是非常实际,它只是不同于一般的“经济资本”,要依靠符号的运作来实现。所以“symbolic capital”应该翻

译成“符号资本”。这一点从布迪厄的其他相关概念中可以得到确认,如“consumption of symbols”(符号消费)和“symbolic violence”(符号暴力)。我国明代帝王朱元璋所施加的文字狱就是布迪厄所说的“符号暴力”,皇帝剥夺他人使用和修改某些符号的做法绝非“象征性”的。皮尔斯对“symbol”的用法非常特别,在他的定义中这类符号不依赖于以像似性和比邻关系为基础的推理,而是习惯成自然。陈、王二位先生的译法是“象征符号”,这与皮尔斯自己的解释相去甚远。我在《语言的符号性》里将这一术语译成“抽象符号”,以示与其他两类符号的区别。后来在其他文章中我又将其改进为“常规符号”,这与赵毅衡先生《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中的译法“规约符号”不谋而合。这样,与其相关的术语“symbolization”和“desymbolization”也可以顺着翻译成“规约化”和“去规约化”,以表示符号从指示符号或像似符号向规约符号的转变及其人为的反向过程。

除此而外,《语言的符号性》基本保持原貌,在此与新增的章节放在一起,再次就教于国内同行。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我国符号学研究近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符号学领域的新成果不断问世,南京师范大学甚至创办了用英文发表的《中国符号学研究》杂志,并计划在南京举办国际符号学协会下一届代表大会。《符号与意义》这本小书旨在为日益蓬勃的符号学事业添砖加瓦。

丁尔苏

2011年夏写于黄金海岸

目 录

导言	(1)
第 1 章 索绪尔的消极影响	(1)
1.1 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的定义	(1)
1.2 结构主义及其困境	(8)
第 2 章 寻找新的符号模式	(22)
2.1 来自符号学领域的批评	(22)
2.2 皮尔斯的符号三分法	(43)
2.3 语言符号的再定义	(54)
第 3 章 建立以词语为中心的研究方法	(67)
3.1 指称与结构的统一	(67)
3.2 符号·文本·世界	(75)
第 4 章 符号的实际运作	(103)
4.1 符号的像似性	(103)
4.2 比喻的“边”与“柄”	(114)
4.3 比喻的文化趋向	(126)
结束语:理据性与任意性并行不悖	(158)
参考文献	(173)

第一章 索绪尔的消极影响

索绪尔是第一位正式将语言研究纳入符号学视野的语言学家,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明确指出语言学是符号学的一部分。换言之,索绪尔十分强调语言的符号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立场使得他实际上将符号的核心(即符号意义)排除在语言学之外。正如澳大利亚学者霍奇(Robert Hodge)和克莱斯(Gunther Kress)在他们合著的一本书中所说:“共时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具有价值的符号(系统或组合与聚合关系中的位置)及其意指活动(语言外部的指称关系)。与在其他方面的做法相一致,他[索绪尔]选择作为考察对象的是价值(系统关系),而不是意指活动。符号本身由两部分组成,即能指(意义载体)和所指(概念或意义)。索绪尔虽然没有完全忽视对所指的考察,但他的主要兴趣是在能指上面。”^①索绪尔的这一选择导致了此后结构主义过分注重符号系统关系而忽视符号本身意义的不良倾向。

1.1 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的定义

人类对语言的符号本质的关注由来已久,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有许多学者就这个问题作过精辟的论述。例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把语言说成是表达心灵印象的符号,而文字又是口头语言的符号。尽管如此,

^① 霍奇等:《社会符号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17页。

直至 20 世纪初期,人们关于语言符号性的讨论仍然是要么旁敲侧击,要么只言片语,缺乏今日学术论证的严密性和系统性。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的出版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在那本书里,索氏率先将语言同社会生活中其他各种符号系统相提并论,从而把语言研究放到了他所谓的“关于符号的统一科学”中进行。

要了解语言的符号本质,首先必须回答“什么是语言符号”这个语言学 and 符号学的根本问题。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一部分的第一章中,索绪尔把语言符号定义为“概念与声音模式(a sound pattern)结合体”,^①其中声音模式可被视为“物质”成分,虽然它只是一种听觉印象,而与它对应的则是更为抽象的思想单位。索绪尔用下图(图 2)来说明语言符号:



图 2

索绪尔进一步指出,就这样给语言符号下定义会带来一个术语上的问题,因为在一般人的眼里,符号这一术语指的仅仅是声音形式。例如,人们常常把 /tree/ 看成语言之外具体木本植物的符号。其实, /tree/ 之所以能够指称物体,是因为在该声音形式的背后还有“树”的概念。所以不应该把符号的物质部分看成是符号的全部。为了避免这一术语上的歧义,索绪尔建议将语言符号的两个组成部分分别改名为“能指”和“所指”,而把这两者的结合称为符号(图 3):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 6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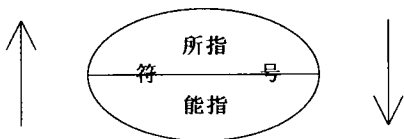


图 3

一般说来,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这一点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人体的顶端部位”既可以用英语的语音组合/head/来指称,也可以用汉语的语音组合/tóu/来表示,只要使用特定语言的社团成员接受它们的用法,语音组合与语音组合之间没有高低或者优劣之分,它们都能够胜任连接音和义的任务。也就是说,“头”的概念和/tóu/的语音组合连在一起,其中没有什么内在的原因。索绪尔在论及这个问题时说:

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

例如“姊妹”的概念在法语里同用来做它的能指的 s-o-r 这串声音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它也可以用任何别的声音来表示。语言间的差别和不同语言的存在就是证明:“牛”这个所指的能指在国界的一边是 b-o-f, 另一边却是 o-k-s。^①

在许多人眼里,索绪尔提出的任意性原则是现代语言学对整个人文研究的一大贡献,有人甚至认为它引起了西方近代思想史中的一场革命。从表面上看,索绪尔只不过在这里肯定了一个有关符号活动的非常传统的命题。在他之前,许多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曾经提出同样的观点,而且他们使用的几乎是相同的术语,如美国 19 世纪语言学家惠特尼(William D. Whitney)也讨论过“语言是习惯”的问题。但索绪尔对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有着与众不同的解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 67—68 页。

释。他接下来告诫读者,不要狭义地去理解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否则就会忽视这一基本概念的深层含义。他说:

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没有人反对,但是发现真理往往比为这个真理派定一个适当的地位来得容易。上面所说的这个原则支配着整个语言学,它的后果是不胜枚举的。诚然,这些后果不是一下子就能看得同样清楚的;人们经过许多周折才发现它们,同时也发现了这个原则是头等重要的。^①

换句话说,要真正理解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上。一般人在理解语言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的任意结合时,都倾向于把语言看成是名称的贮藏库,以为这些名称被任意地同事先存在的外部事物相连接。亚当给万物命名的圣经故事在西方广为流传这一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正是这种普遍的看法需要我们去纠正。在索绪尔看来,概念本身是由语言创造的,因而不可能有先于语言或者先于符号的客观存在。

可见,索绪尔所谓的任意性原则与人们对这个概念的一般理解不是一回事。在其专门讨论索绪尔思想的著作中,卡勒(Jonathan Culler)就索氏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的特殊意义解释如下:

语言不是简单地给独立存在的概念任意命名。它一方面在自己选择的能指之间建立起某种任意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在自己选择的所指之间建立起某种任意关系。不同的语言不仅仅产生不同的能指组合,以独特的方式分割声音连续体,而且每一种语言都产生不同的所指组合;它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68页。

以独特的因而也是“任意的”方式将世界分成概念或范畴。^①

凡是有一定双语经验的人都能够比较容易地理解上面这段引文的含义。我们可以试着将/wish/这个英语单词翻译成法语。在目标语(target language)里有两个词与源语言(source language)中的词语在意义上接近:/vu/和/desir/,但这两个词所包含的概念范围与它们在英语中的对应词不相等。/vu/的词义与/wish/的词义只是部分对应,只有当/wish/被说话者用来表达对别人的祝愿时,这两个词的意义才相同(该词词义的另一部分与英语中的/vow/相对应)。如果将/wish/翻译成/desir/,我们也会碰到同样的问题。/desir/的概念范围大于/wish/,它的意义还包括英语词/desire/所表达的成分。这种语言与语言之间在词语概念上的差异常常使翻译工作者感到头痛,但它恰恰证明不同的语言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切割所指连续体的。

通过上述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差异,索绪尔希望揭示一条他认为是十分重要的语言学原则,即语言不仅仅是能指与所指结合物的总和,它首先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其中任何一个部分都必须以整体的存在为前提:

……把一项要素简单地看做一定声音和一定概念的结合将是很大的错觉。这样规定会使它脱离它所从属的系统,仿佛从各项要素着手,把它们加在一起就可以构成系统。实则与此相反,我们必须从有连带关系的整体出发,把它加以分析,得出它所包含的要素。^②

也就是说,语言在任何时候都呈现一定的组织形式,索绪尔把这种内在的语言组织称为系统,后来的理论家有时亦称之为结构。他认为,我们不可

① 卡勒:《费迪南·德·索绪尔》,企鹅公司1977年版,第15页。

②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12页。

以简单地找出与某一语言单位相对应的非语言物体或状态,然后说这是该语言单位的意义。相反,如果要确定某一语言单位,我们应该首先将这一单位放到它所处的整体组织中去,放到它与其他成员的关系中去。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索绪尔打了一个后来引起很大争议的比方:在象棋里,具体棋子的特点完全是系统差别的一种功能。只要我们能够将一个棋子与其他棋子区分开来,它们的具体物理形状如何,是用什么物质材料做成的都不重要。假如/帅/这颗棋子不小心被丢失了,我们可以用任何尺寸、任何材料的物体来替代它,只要新启用的棋子不与代表不同价值的其他棋子混淆起来就行。同样道理,语言成分本身的物理特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与其他成分之间的关系,因为任何一个语言符号都是通过它与其他符号的“不重合”(noncoincidence)来获得自身价值的。我们假设有两个人在交谈,其中一个人说:“我最近在读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另一个人问道:“什么书?”/书/在这里出现了两次,虽然这个声音组合的发音会因人而异,但我们仍然能够认出它们是同一语音符号的不同变体。那么,我们是如何确定这两组不同的嗓音属于同一个符号的呢?索绪尔的回答是,语音符号的识别牵涉到整个语音系统。能指并不是由这个或者那个讲话者发出的物理声音,而是与系统中其他成分相联的抽象单位。只要不跟其他符号混淆起来,该音素组合的具体发音可以因人、因地、因时而异。语言中所有的语音元素都处于连带关系之中,其中每个单项的价值都是其他各项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

这一情形同样发生在语言系统中的概念层次上。概念或所指不是由某些非语言的属性所规定的独立实体,它们是语言系统的一部分,并被该系统的其他成分所规定。就以在非欧洲文化背景下长大的人学习表达颜色的英语词语为例。按照卡勒的解释,如果我们向学生显示带有具体颜色的物体,企图让他理解表达不同颜色的词语的意义,即使我们将棕色物体显示 500 次,他还是不会知道什么是棕色。外国学生之所以掌握不了/brown/这个词的意义,是因为英语所采用的是一种特殊的区别棕色和黄色、棕色和褐色、棕

色和红色、棕色和灰色的方式。我们在语言中看到的不是预先存在的观念，而是由系统发出的价值。所谓价值就是纯粹的差别，它的确切特征为：不是别的东西。/brown/本身不具有某种本质的特征，它只是表达各种不同颜色的词语次级系统中的一员，因而其意义由与它相邻的描述其他颜色的词语所规定。以此类推，要把握任何一个成分的意义，就必须首先理解与该成分形成对照或区别的其他成分。索绪尔这样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语言中只有差别。此外，差异一般要有积极的要素才能在这些要素间建立，但是在语言里却只有没有积极要素的差别。就拿所指或能指来说，语言并不可能有先于语言系统而存在的观念或声音，而只有由这一系统发出的概念差别和声音差别。^①

前面提到，索绪尔部分地接受了传统语言学的观点，把符号意义看做“听觉形象的对立面”，但他认为声音与概念的结合只不过是符号意义的一部分。出于系统的考虑，索绪尔反对将概念看成被简单地同声音系列结合在一起，因为无论是声音系列，还是概念单位，它们都跟系统内其他成分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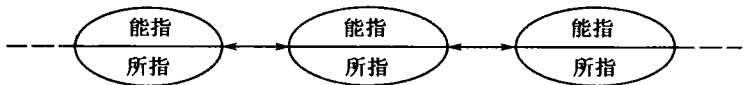


图4

索绪尔把这种联系称为“价值”(value)。用他自己的话说：

一个词可以跟某种不同的东西即观念交换；也可以跟某种同性质的东西即另一个词相比。因此，我们只看到词能跟某个概念交换，即看到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18页。

它具有某种意义,还不能确定它的价值;我们还必须把它跟类似的价值,跟其他可能与它对立的词比较。我们要借助在它之外的东西才能真正确定它的内容。词既是系统的一部分,就不仅具有一个意义,而且具有一个价值;这完全是另一回事。^①

索绪尔把语言符号的系统关系分为两大类:即组合关系(syntagmatic relation)和聚合关系(paradigmatic relation)。组合关系指的是符号在具体意指过程中与周围其他符号结成的联系,这种联系只能在实际的话语中得以实现,主要表现为话语成分相互之间的联结和呼应。聚合关系依靠的是符号在能指或所指层面上的形、义类似。在能指层面上,语言符号的类似现象包括具有共同前缀和后缀的词语、相互押韵的词语以及同音异义词语;在所指层面上,构成符号类似现象的有同义词和反义词,等等。此外,有的符号可能同时在两个层面上相似,如法语里的/éducation /和/instruction/,它们既有相同的后缀,又都表达“教育”的意思。所有的符号都处在这两种结构关系之中,它们的意义一部分由共处于相同系统中的其他成分所规定,一部分由具体话语中其他相邻的符号所规定。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的论述超出了人们对能指与所指之关系的一般理解,我们只有把他的任意性原则与系统性原则连在一起考虑,才能够把握这一见解的深层意义,这也是正确理解和超越索绪尔符号理论的关键。

1.2 结构主义及其困境

索绪尔为语言符号所下的定义,尤其是他对语言符号结构关系的强调,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14页。

极大地影响了此后几十年的西方语言学研究。从整体上看,注重分析和描述语言符号之结构是 20 世纪西方语言学研究的普遍倾向,并由此形成所谓结构主义的思潮或流派。当然,作为一种特殊的研究方法,结构主义的操作范围远远超出了语言学领域,受它影响的还有文化人类学、生物学、心理学、哲学、文艺批评等其他人文和社会学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几乎所有领域里的结构主义思潮都源于索绪尔关于符号的理论,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只关注诸种社会文化现象之间的联系,而不重视这些现象本身的性质。

首先应该承认,结构主义语言学在语音层次的研究上确实硕果累累,成绩斐然。我们在前一节里提到,索绪尔坚持语言形式的物理特征本身不具有语言学意义,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结构关系。这一观点后来被俄国语言学家特鲁别茨柯伊(Nikolai Trubezkoy)和雅柯布森(Roman Jakobson)直接应用于语音研究,建立了与传统语音学相对立的音位学。在他们看来,虽然索绪尔关于语言是相对价值系统的观点具有划时代意义,但它并没有被充分贯彻到语言分析的每一个层次。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现代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发展,从声学或者发声的角度研究语音问题一直是语音学工作者的主要任务。但语音学家们往往只重视语言声音的物理学和生理学特征,而忽视这些声音在它们所处系统中的作用。为此,音位学家们提出了语音研究的功能方法,以强调分析语言声音相互之间的结构关系。

特鲁别茨柯伊率先作出音素(phone)和音位(phoneme)的区分。按照他的解释,音素是人体若干发音部位联合活动、由一次发音动作所构成并能够为听觉器官所直接感受的最小语音单位。如发汉语的 a [A](啊)时需要声带、软腭、舌头、嘴唇等器官以一定的状态做出相应的动作,因此音素具有若干方面的生理规定;音素还具有音的强弱、长短、高低和厚薄等方面的物理特征,所有这些特征的整体存在即构成语音单位。音位则指具体语言中语音的最小功能单位,它本身没有意义,而只区别词语、词组等语言单位的语音外壳,从而间接地辨别它们的意义。汉语普通话里/天/和/颠/之所以成为词

语,是由于构成它们的语音单位[t]、[d]、[i]、[a]和[n]都是汉语普通话中的音位。从语音学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在实际的语流中识别几乎无限数目的音响种类,但音位学却把它们缩减至仅在语音系统中起到区别功用的那些成分,即所谓的音位对立。鉴别语音系统功能的依据是意义的变化与否,音位学家一般通过具体情境中的语音替换来进行测试(commutation test)。例如,在英语中,[n]的发音会因人而异,但只要不跟其他语音成分混淆起来,它的各种变体仍然属于同一个音位;反之,如果把/night/中的[n]发成/light/中的[l],就会引起词义变化。此外,不同的语言产生不同的音位系统,[n]和[l]在英语里是两个不同的音位,但它们在汉语南京方言里却属于同一个音位,确切地说,它们是同一个音位的不同变体。

上述对语音系统的结构主义分析又被雅柯布森向前推进了一步。他指出,音位虽然是语音组合中的最小单位,但它们还可以被继续划分为在发音部位上相互对立的区别性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s in binary opposition)。这些特征的总数小于音位的数量,而且适合于对所有语言的描述,所以又被称为音位的普遍结构(phonological universals)。请看下面的英语辅音和英语元音的区别性特征组成表:

表格 1 英语辅音区分特征组成表
Distinctive feature composition of English consonants

		p	b	m	t	d	n	k	g	ŋ	f	v	s	z	θ	ð	ʃ	ʒ	ç	j	l	r	w	y	h
音节	Syllabi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辅音	Consonan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响音	Sonoran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